

中东欧国家周报

【爱沙尼亚社会周报】

移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E-MAP 基金会

(2021年9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Feng Zhongping



【爱沙尼亚】移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移民作为社会政治现象，对爱沙尼亚来说有特殊的内涵。由于在 20 世纪遭受了多种占据，爱沙尼亚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挑战，这些挑战与移民潮直接相关。其中最显著的仍然是与历史遗留的种族不平衡问题有关，这仍然是当地政治制定者严重关切的问题。在任何时间，爱沙尼亚内部的政治辩论都会（有意或无意地）“纳入”所谓的“民族牌”，无论是涉及到学校教育、公民身份问题、地区工业生产能力和气候变化甚至是反新冠疫苗接种方面。

的确，正如普尔（Puur）等人所论证的，“持续的移民导致了人口构成方面的巨大转变，当时的多数民族（爱沙尼亚人）的比例从 1945 年预估的 97% 下降到最后一次苏联人口统计（1989）的 62%，而在同一时期少数民族群体的比例上升达到 38%”¹。苏维埃占领爱沙尼亚成为分析这个波罗的海/北欧国家发展的事实上的“参数”，二战后时期以一种特殊类型的移民为特征，这种移民是“由政治和意识形态动机引导和刺激的……，……为被苏维埃占领的爱沙尼亚带来一波共产党员、苏维埃军队人员以及来自苏联

¹ Allan Puur, Leen Rahn, Luule Sakkeus, Martin Klesment, and Liili Abuladze, ‘The formation of ethnically mixed partnerships in Estonia: A stalling trend from a two-sided perspective’ in *Demographic Research*, vol. 38, article 38, 2018, p. 1117.

(USSR,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其他国家的大量工业劳动力”²。

从社会的角度，政府接管的影响不能在所有情况下得到准确的测量，但尽管是一些估计，也足以理解所做改变的程度。例如，根据一个可信的报告，“在1959到1979年的人口普查之间，爱沙尼亚民族混合的夫妻比例从10%增加至16%”，“截至1970年代末期，在爱沙尼亚民族中，多数和少数民族混合夫妻占有所有已婚和未婚同居的13%”³。另一个很好的说明来自图努·帕明（Tõnu Parming）在1972年发表的材料，其中指出，“在1950至1959年之间，爱沙尼亚移民数量几乎与自然增长一样大，而从1959年开始，移民数量更大”，然而“大多数的移民都集中在地区和城市⁴”。从简单的数字来看，在1959年至1979年期间，爱沙尼亚的俄罗斯族人口增加了16.9万人，即70.3%⁵。

最近一篇文章，基于2000人口普查产生的数据，讨论了所谓的“同化观点”，发现“与第一代移民相比，在第二和第三代移民中混合族裔伙伴关系更加常见”，“最大

² Katus and Sakkeus 1993 as cited in Kadi Mägi, Maarten van Ham, Kadri Leetmaa, and Tiit Tammaru, ‘The neighbourhood context and changes in self-reported ethnic identity’ i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18, p. 5.

³ Volkov 1989 as cited in Puur *et. al.*, p. 1119.

⁴ Tõnu Parming, ‘Population Changes in Estonia, 1935-1970’ in *Population Studies* (Taylor & Francis, Ltd.), vol. 26, no. 1, 1972, pp. 53-78.

⁵ Augustine Idzelis, ‘Industrialization and 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Baltic Republics’ in *Lithuanian Quarterly Journal of Arts and Sciences*, vol. 30, no.2, 1984.

种族的成员（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族）最不可能与多数民族人口（爱沙尼亚人）形成伙伴关系”⁶。这篇材料中还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强调了“与社会交换理论的预期相反，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成员似乎更喜欢同族人而不是多数民族的伴侣”⁷。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大量俄语使用者”离开了爱沙尼亚，但是2011年的人口普查发现“大多数俄语使用者都留在了这里”，占爱沙尼亚人口的30%⁸。

上述爱沙尼亚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性移民和城市化之间的联系描绘了第二个主要问题——他与政治经济和结构变化相互联系，爱沙尼亚经济从1945年到1991年不得不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苏联即将解体的时候，该国90%的非爱沙尼亚社会阶层居住在城市地区⁹。例如，在苏联统治之下，受到“爱沙尼亚开始快速和广泛劳动力工业化以及外部移民的作用”¹⁰的影响，该国首都塔林（Tallinn）经历了“稳步人口增长，塔林城市群的形成以及西方式郊区化的结束”。在数字方面，该市人口数量从134,000人（1944）

⁶ van Ham and Tammaru 2011 as cited in Mägi *et. al.*, p. 1119.

⁷ van Ham and Tammaru 2011.

⁸ van Ham and Tammaru 2011 as cited in Mägi *et. al.*, p. 1119.

⁹ Tiit Tammaru, 'Differential urbanisation and primate city growth in Soviet and post-Soviet Estonia' in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vol. 91, no. 1, 2000, p. 25.

¹⁰ Tammaru, p. 27.

上升至 166,000 人（1947），之后到 479,000 人（1989）¹¹。

在经济方面，尽管“在 20 世纪初，爱沙尼亚是俄罗斯帝国最发达地区之一”，他“每一千名居民中工人的数量是原来的两倍，产量是原来的三倍”，但该国是“小规模工业化且与俄罗斯关系较弱”¹²。苏维埃时期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前述的现状。正如所论证的那样，波罗的海地区的自然资源以及高度熟练的劳动力在将工业化“转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这些产业需要最少的进口原材料燃料投入”，并促进了“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轻工业和食品加工业”¹³。在爱沙尼亚，到 1980 年，后三个行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67%¹⁴。

最重要的是，到 1950 年（二战结束后仅五年），页岩油的产量相比于 1939 年已经翻番，达到了 350 万立方公吨的水平，到 1980 年惊人地上涨到 3130 万立方公吨¹⁵。此外，根据记录，1950 年电力的产量比 1938 年高出约三倍，在 1980 年代达到顶峰。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只占苏联总人口的 2.8%，但波罗的海在苏联某些制造业总产量中占相

¹¹ Tammaru, pp. 23-24.

¹² Heido Vitsur, ‘A hundred years of the Estonian economy’ in *Estonian World*,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estonianworld.com/business/a-hundred-years-of-the-estonian-economy/>].

¹³ Idzelis.

¹⁴ Idzelis.

¹⁵ Vitsur.

对较高的比重”——例如，爱沙尼亚生产的电动机和挖掘机占苏联总产量的6%¹⁶。

自重获独立以来，前苏联政策移民政策的结果变成了爱沙尼亚发展其新身份的社会基础——显然，在各种层面上看，这个国家和1940年被占领前的国家是有所不同。我们无法假设历史、政治经济和人类发展，因此，从1990-1991年起，爱沙尼亚的做法非常务实——在政策制定领域积极地反思社会现状。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发展指数（HDI）方面，他有大量教育，收入和健康的可测量指标，“从1990到2015年，仅仅只有其他两个欧盟成员国的HDI指数的增长速度超过爱沙尼亚”¹⁷。

这些天来，移入爱沙尼亚的人数超过了迁移出境的人数，而且，据报告所述，入境流代表了一个零散的社会阶层，对此可以进一步分类：1）返回爱沙尼亚的人（约占总数的50%），2）来自前苏联地区（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人，3）来自其他欧盟成员国的人，以及4）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人¹⁸。此外，“苏联”式的城市化在爱沙尼亚仍然盛行，有69%的人口都更喜欢居住在城市和小城镇，这与

¹⁶ Idzelis.

¹⁷ Brendan Seney and Daniel Baldwin Hess,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Estonia: Adapting in an Age of Immigration’ in *The Baltic Times*, 8 August 2018. Available from [https://www.baltictimes.com/population_migration_and_estonia__adapting_in_an_age_of_immigration/].

¹⁸ Seney and Hess.

1987年记录的数字数量基本相似（71%）¹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因为该国的乡村居民“就业机会更低，而爱沙尼亚的城市居民在新的市场经济中表现得相对较好”²⁰，这种情况也反映在货币方面——据发现，“爱沙尼亚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高于欧盟平均水平，而该国农村地区居民人均收入则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考虑到这些以及其他具有细微差别的地方和全球发展，《2019/2020年爱沙尼亚人类发展报告》（*Estonia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2020*）制定了一些探索性的情景（共四种），以说明爱沙尼亚在三十年后显而易见的一系列可能的未来（见图1）。正如材料作者所解释的，“未来情景的主轴是居住结构和公共空间”²¹，而两条轴线（从个人到公共空间，从乡村到城市生活）有助于将集群分开，使其明显可见。例如，公共空间轴展示了这一类别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当“普通公民根据其个人消费能力获得公共空间和服务”时，“更具体地关注数据、流动性和可及性问题”²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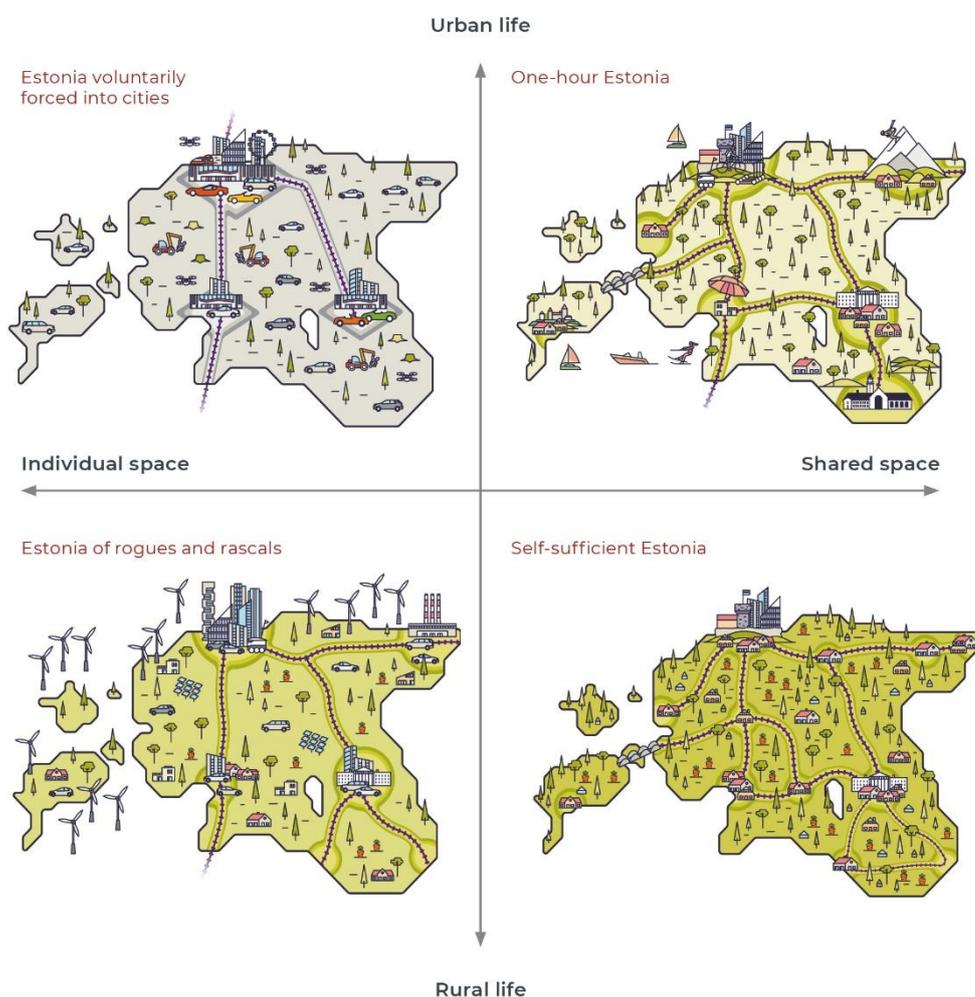
¹⁹ Statistics Estonia as cited in Kristi Grišakov and Mihkel Kaevats, ‘Estonia 2050 scenarios’ in *Estonia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2020*. Available from [<https://inimareng.ee/en/estonia-2050-scenarios.html>].

²⁰ Seney and Hess.

²¹ Grišakov and Kaevats.

²² Grišakov and Kaevats.

图表 1 爱沙尼亚 2050 年居住结构和公共环境坐标轴下的生活环境设想



城市生活

自愿被迫进入城市的爱沙尼亚	一小时的爱沙尼亚
个人空间	公共空间
流氓和无赖的爱沙尼亚	自给自足的爱沙尼亚

乡村生活

来源：格里沙科夫和凯瓦茨（Grišakov and Kaevats），爱沙尼亚 2050 年情景

报告中勾勒的每一种情况都必须有一个特定的故事，且与之相关，无论是“自愿被迫进入城市的爱沙尼亚”，还是“一小时的爱沙尼亚”，“流氓和无赖的爱沙尼亚”，还是最后“自给自足的爱沙尼亚”。然而，无论这个国家在三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动荡的二十世纪期间，这些移民潮的长期影响仍将在爱沙尼亚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部分“清晰可见”。

（作者：E-MAP 基金会；翻译：孟卓凝；校对：戚强飞；
签发：陈新）